

理事長演講

## 論社會科學的開放性與公共性\*

顧忠華

\* 顧忠華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2004-2005）（[chku@nccu.edu.tw](mailto:chku@nccu.edu.tw)）。日前筆者應邀赴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舉辦之「教育部第一梯次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人文社會科學部分成果發表會上，進行專題演講，主題為「人文社會科學的開放性與公共性」，本文改寫自該講稿，除限縮題旨範圍於「社會科學」之外，並針對目前影響學術發展甚鉅之若干現象，提出個人初淺見解，尚請各位先進不吝指正。

## 中文摘要

近年來，台灣的學術評鑑制度引起諸多爭議，此一學術政策建立在特定知識觀之上，譬如假設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並無二致，皆可透過論文於期刊發表的數量，來評鑑研究的績效等等。本文從社會科學的反身性談起，一方面探究社會科學在當前制度環境下遭遇的困境，另一方面論述社會科學知識應具有「開放性」和「公共性」的特質，方足以重建社會科學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本文亦針對前美國社會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會長布洛威（Michael Burawoy）大力提倡的「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進行不同類型社會學知識的討論。本文指出，無論專業社會學、政策社會學、批判社會學、或是公共社會學，都奠立於社會脈絡之上，因此「開放性」和「公共性」意味著共通的普遍質素，讓知識可以更為靈活地與社會交織，並產生改善人類生活的效益。本文認為，開放性是使學術自由成為可能的條件，如果沒有足夠的開放性，知識像是處於封閉空間之中，不能令想像力盡情飛翔；而「公共性」則是使學術責任能夠落實的助力，如果缺乏豐沛的公共性，知識像是鎖在私人倉庫之中，不能發揮造福人類的效益。而台灣的學術界想要擺脫「知識代工」的宿命，須從誠實的自我批判著手，一步步解構不合理的權威、不必要的管制、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如此才能真正激發台灣學術發展的潛能。

**關鍵詞：**社會科學、開放性、公共性、合法性、正當性、公共社會學

## **On *Openness* and *Publicnes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hung-Hwa K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ident, Taiwanese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004-2005)

### **Abstract**

Many recent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Taiwan's academic environment, for example,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use of SCI or SSCI as indices of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Some measures are considered controversial, yet they are already exerting significant impacts 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wo attributes of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that form viewpoint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with the main argument being that all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is reflexive in essence, and any discourse of knowledge legitimacy can only be reconstructed when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fulfills the requirements of openness and publicness. Finally, I argue that in order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and the world we live in, we must improve our academic environment by increasing our appreciation of multiple, critical, and reflexive values in order to win the public trust.

Keywords: social science, openness, publicness, legitimacy, public sociology

## 一、前言：從兩種批判傳統談起

人類很早便意識到自己屬於群居的社會性動物，各式各樣引導及規範人們互動關係，或執行特定集體功能的制度設計，也完全來自人類自己的設計。這是為什麼數千年前，荀子便以「偽」字來形容包括法律、道德、政治等等「人爲」的制度，而認為古代聖王選擇了「化性起偽」，從而制定了分配性的「禮」，來節制且超越人性原有的欲望和衝動。<sup>1</sup>

及至現代社會科學興起，人們愈益明白自己的種種作為充滿了「反身性」(reflexivity)，包括知識的生產、傳播和應用，莫不都會反過來加諸己身，造成一定的後果。當代西方的重要社會學者，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貝克(Ulrich Beck)等人，皆不約而同地探討了「反身性」的議題。布迪厄提醒社會科學家，應該採用自我反省的態度來了解科學研究本身的社會及文化限制；紀登斯和貝克則在深入檢討現代社會的「信任」和「風險」問題後，合作提出「反身式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的概念，作為解決當代諸多困境的對策，譬如貝克以「回飛棒效應」形容人類創造的高科技文明(如核能技術)有可能本身成為製造高風險災難的來源，便十分扼要地點出了知識的兩面刃特性。<sup>2</sup>而本屆台灣社會學會年會的標題為「台灣社會與社會學的反思」，更是代表了台灣社會學者們的自我期許，希望

---

<sup>1</sup> 見《荀子，性惡》，此處引自葉仁昌(1996：172)。

<sup>2</sup> 對於布迪厄「反身社會學」(reflexive sociology)基本理念的簡略介紹，可參見黃厚銘(2004)；就紀登斯和貝克之論點，著作相當多，主要見Beck、Giddens及Lash(1994)、Beck(1986)、Giddens(1991)等，中文討論請參見顧忠華編(2001)。

研究的成果能夠與社會其他成員共享，並共同促進社會的改造。

事實上，西方學術界不乏對於科學知識的本質和社會角色進行過激烈的辯論，以社會學界為例，在1961年即發生過著名的「實證主義論戰」(Dispute on Positivism)，當時是德國社會學會(Deutsche Gesellschaft fuer Soziologie)舉辦年會，邀請波普(Karl Popper)主講「社會科學的邏輯」，波普是享譽盛名的科學哲學家，他提出「證偽」的論點，主張科學知識是不斷尋找現存理論的否證，一旦能夠找到新的證據，推翻了流行的見解，就代表了知識的進步。因此他強調的「批判理性主義」(Critical Rationalism)強調研究不應有任何禁忌，必須在開放、自由的環境中，讓科學家不斷挑戰知識上的權威，才可能獲得知識的增長。

對於波普的論調，德國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er School)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並不同意，他在年會上發表了同樣題目的論文，但是論點與波普完全針鋒相對，因此引發了這場論戰。法蘭克福學派鼓吹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特別著重揭露科學的「偽中立」，認為科學本身其實已淪為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一環，各種資源配置和研究主題常常只在服務特定的政治、經濟勢力，而無法真正朝向「公共及整體利益」，更遑論對抗極權主義政權的各種不正義行徑(Adorno et al. 1976)。

本文一開頭簡述這場論戰，是因為不論參與論戰雙方的論點有無交集，但卻分別指出了學術知識的內在和外延特性：「批判理性主義」揭糞了知識的內在探索不應該設限，因此任何知識—無論自然或人文社會科學—都具有「開放性」，並在無休止的自我批判中前進；「批判理論」則大聲疾呼科學家仍應該積極介入社會的改革，不能蒙著眼睛助紂為虐，因此要維護社會正義，強化「公共性」。他們這兩個批判傳統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示，也點出了今天的主題。

## 二、社會科學的開放性與公共性

從「反身性」的觀點來分析，學術研究屬於社會分工的一環，其工作條件以及資源配置在在都受到周遭社會環境的影響，有如「新制度論」(The New Institutionalism)視經濟活動為「鑲嵌」(embedded)在社會脈絡中的制度和行動般，我們也可以發現：各種有關學術組織（如大學、研究院）、學術發表（期刊、研討會）、學術品管（論文審查、評鑑）、乃至學術資格（聘任、升等）的制度性安排，以及如日前「卓越計畫」、「頂尖大學計畫（五年五百億）」等涉及資源分配的決策，確實都和「學術這一行」如何建構自己的「行規」，又如何適應外在制度環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的變遷息息相關。不過，學術知識在今天的地位，或是這些環繞著學術所發展出來的制度，當然有一段長久的過程，也歷經十分曲折的演變，我們不妨先以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回顧影響重大的幾股社會—歷史脈絡。

在柏克（Peter Burke）所寫的《知識社會史》（*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一書中，其副標題是《從古騰堡到狄德羅》（*From Gutenberg to Didero*），反映了近代以來的知識發展，是和知識傳播方式和知識生產體制的改變息息相關。而歷史考察更告訴我們，西方由中世紀進入現代階段，剛開始的變遷動力並非來自我們今天如此相信的「科技」，而是來自宗教上的創新，也就是「宗教改革」爆發的重大衝擊。馬丁·路德的學說藉著印刷術的普遍應用，得到到處傳播，他並將拉丁文聖經翻譯成德文，好讓一般民眾能夠用熟悉的語言了解聖經內容，從路德開始，西方人追尋知識有了更大的空間，因為絕對的宗教權威受到了挑戰，而宗教自由的確立還連帶保障了思想、言論、講學、研究的種種自由。隨後經過啟蒙運動、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加上資本主義的興

起，知識完全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型態（Burke 著、賈士衡譯 2003）。柏克還提到人類在知識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發明，就是「大學」的誕生與擴散，剛開始大學教授的科目，主要包括神學、法學、醫學和文學四大範疇，這代表人文和社會的關懷，基本上構成了當時「認知旨趣」的核心。到了十九世紀，由洪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建立的柏林大學模式，結合了研究與教學，在推動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上獲致了顯著的成果，也成為不少新成立大學的楷模（同上引：101）。

不過，二次世界大戰後，知識的動向有了更明顯的調整和分化，反映在大學的角色和功能上，也有了大幅的變化。由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主持的《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中，強調無論從數量，或從覆蓋的地區來看，大學系統在世界各地都有驚人的發展，這使得專業社會科學家的人數成倍地增加。大學勢不可擋的擴張趨勢，不但造成社會科學專業領域的重組，同時也引進了需要大規模投資的大型研究，結果是自然科學式的「科學典範」（scientific paradigms）在社會科學內部取得了全球範圍的合法性，並加強了研究普遍規律的傾向（Wallerstein 著、劉鋒譯 1996：31）。

華勒斯坦的報告進一步指出，由於政府預算相對緊縮，各門學科在資源分配上展開了曠日持久的爭奪戰，而行政部門的考量，往往形成大學或研究機構按照新的學術範疇重新調整組織結構的壓力。有趣的是，原本在十九世紀上半葉，許多新的學科紛紛冒出頭，但在 1850 到 1945 年之間，社會科學能夠劃分的門類數量逐漸減少，最後只剩下我們熟悉的少數幾個門類。只是隨著組織的分散、擴張，近年來又開始了相反的過程，出現不少五花八門的、層出不窮的新興學科。換句話說，學科內部邊界的重組—不光是社會科學，也同樣適用於自然和人文科學—似乎再度「開放」（open），並提供了新的科際整合或知識創新的機會（同上

引：64)。

台灣的學術環境，放置在前述的變遷脈絡裡，卻顯得不由自主，行政凌駕學術的情形更是嚴重。尤其最近掀起一波波「大學排名」競爭的熱潮，從SCI、SSCI作為大學評鑑指標引起的風波，到「五年五百億」計畫的爭議，暴露出這種功利取向的資源分配模式，極有可能無法真正扣緊「開放性」的意涵，反而加劇了圍繞著預算資源而展開的無休止的鬥爭。因為就知識的「開放性」來說，不應該遷就過於化約的評鑑指標，否則容易產生不利學術發展的負面影響，扭曲了學術研究的自由度及創造性，使得學術界新進成員以追逐量化的論文數量為重，反而忽視了學術的多元和品質。這樣的顧慮並非危言聳聽，葉啟政教授即以〈台灣社會學的知識—權力遊戲〉為題，痛陳目前學術主流背後的意識形態可能妨礙了「有個性、富創意」的研究取向，認為這種趨勢將使學術研究在台灣淪為「裝門面的裝飾品」而已（葉啟政 2003：28）。<sup>3</sup>

不容諱言，社會科學在當前台灣社會處處「績效思維」掛帥的情境下，被迫適應完全向自然科學「傾斜」的遊戲規則，以致可能被「科學至上主義」邊緣化。西方曾經歷對於「兩種文化」如何調和的長久論辯，但自然科學的「霸權」，在西方仍多少受到人文和宗教傳統的制衡，相對地，台灣屬於「移植」現代科學的非西方世界，「科學至上主義」加上源自社會文化傳統的「實用主義」，社會科學更不容易維持這類型知識應有的地位，並產生無論在資源爭取或在社會影響力上愈益不

---

<sup>3</sup> 葉啟政的文章主要從「國際化」和「本土化」的緊張關係切入，但同時對於學術社群中「由隱性學術派閥到隱性權力集團」的現象感到憂心。他也批判國內愈來愈以論文是否刊登於SSCI收錄之期刊，做為「學術有成」的「客觀」標準，從而穩固了「霸權」的基礎（葉啟政 2003：28）。對於大學及學術評鑑制度的檢討，亦請參閱顧忠華（2004）。



如自然科學的危機。我們深知，「重理工、輕社會」的現象由來已久，但確實應該深思這種「傾斜」將來是不是又得付出沈重的代價？包括像台灣社會長期未培養足夠的社會科學人才，也未能有效推廣現代社會科學的知識和素養，因此在各項公共政策和議題的推動上，一方面極度欠缺相關知識系統的建置，另一方面也無法「培力」(empower)有能力參與規劃，並承擔責任的公民，導致台灣的政治、經濟乃至社會的「亂象」層出不窮，遑論從全球觀點來看，過度盲信科技，人類似乎終將面臨「風險社會」或「生態浩劫」等論述提出的種種警告。

社會科學知識的「開放性」，其實就如華勒斯坦在《開放社會科學》一書中描繪的，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和教學者在判斷力和責任感上，應該培養超出狹隘學科觀點的綜合能力，以成熟的智慧為這世界增添更多美好的色彩。他強調：「知識是通過社會而構成的，這意味著更有效的知識也將通過社會而成為可能。」(Wallerstein 著、劉鋒譯 1996：81) 台灣社會如果給予社會科學更寬廣的空間，不斤斤計較一時的「績效」，學術組織如果在「信任」的基礎上允許更多元的研究途徑，尤其在國科會的計畫審查，或是現行的評鑑制度中，能夠少一些「獨尊實證研究」的心態，應該會大大鼓勵投入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工作者發揮創造力和想像力，更自由地探索廣大的知識天地。

知識應該天生是自由而活潑的，求知也應該是自發而認真的，學術研究者進入了以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或「職業」)的領域，最根本的動力還是應該來自求知的熱情，這方面的任何努力也應該獲得社會的承認，我們才能期待學術的生命可以生生不息，並孕育出更多的新知，來滿足人類對於知識的渴求。問題是：在一種帶有「物化」偏見而型塑出的學術環境中，在乎的是「點數」、「篇數」，這些數據甚至走火入魔到可以換算成金錢、物質和排名，我們不禁感嘆知識的開放性反而有可能

遭到扼殺，因為規訓與權力已滲透到研究者的意識之中，打從一開始便不再追求自主性，這樣下去，封閉性將取代開放性，學術研究也淪為「按件計酬」式的勞務契約，這難道是社會科學界樂見的前景嗎？

不過，從「反身性」的角度來看，台灣社會科學界今天遭遇到的困境，也可能是自己造成的。我們必須承認，過去台灣社會科學—或更精確的講：社會學—並未有意識地建構起知識的「公共性」，也就是學術和社會的介面似乎銜接得不夠緊密，以致學術界流通的知識，無法介入到一般民眾關心的層面，而出現某種程度的疏離。或許正是這種距離感，使得台灣社會在討論學術資源應如何分配才算合理的問題時，社會科學可能得到比人文學領域的支持度還要少。只要想想，當奈米科技、生物基因工程和台灣文史研究備受重視，甚至連「全民英檢」都被視作是具有「競爭力」的知識，而社會科學卻顯得「獨憔悴」時，我們不得不佩服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早在1979年便針對知識的「合法性」（legitimation）問題作了一連串的考察，直扣問題核心。

簡言之，李歐塔在《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中，反覆地說明：科學作為知識的一種特殊類型，它之所以被人們接受，認為是「合法」、「正當」的，其實不只需要「知識論」（epistemological）上的理由，還必須依靠「社會政治」（sociopolitical）的論述來加以支持。在不同的時代，這種種合法化科學的論證，各以不同的敘事形式發揮作用。譬如前面提到洪堡德式的大學理念，在李歐塔看來，就巧妙地連結了大學推展科學的任務，以及大學應符合「國家的精神與道德教育」之使命，這種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使得大學得到「學術自由」的特權，因為科學只應遵從自己的法則，「不服任何束縛，也不受任何既定目標的限制」，而大學存在的價值則在於「開放整個知識領域，詳細解釋所有知識的法則與基礎」，亦因此，大學必須具備「思考精神」，如果

「沒有思考精神就無創造性科學的能力」(Lyotard 著、羅青譯 1989 : 222)。

但隨著工業化的進展，這類後設敘事已被棄置不顧，代之而起的，是某種「『解』合法化」(delegitimation)的趨勢，一方面技術設備對於製造科學「證據」的重要性愈益突顯，也引發對財富資源的需求，於是「一種財富、效率和真理之間的等式，也就隨之建立了起來」；另一方面，科學出現大量彼此無法共量的特殊領域，形成多元的語言遊戲，也不再求助於公正的或權威的後設敘事，原先人們相信科學發展有啓蒙或解放的目的，現在則把科學僅僅當作手段與工具，在一個商品化、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讓「知識」全然爲了服務於「經濟」而存在(同上引：230-243)。無怪乎，李歐塔經過這番診斷後，寧願選擇反對「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來作爲「後現代」(post-modern)的解套策略，因爲既然「所有人都陷溺在各種實證主義的學術規範之中，無法自拔」，而且「思考性或人文性的哲學被迫放棄了對合法化的責任」(同上引：235)，那麼不如另起爐灶，標榜不連續、不可証、差異與悖論。<sup>4</sup>

李歐塔雖然精闢地點出了整體學術發展面臨的困境，但是他較少觸及社會科學的特殊處境，如果我們換一種問法，問道：「社會科學在台灣需要有怎麼樣的表現，才能提高這類知識的合法性，從而獲得更多認同與資源？」，或許可以展開另一套論述，正面地來爲社會科學尋求新的定位。如前所述，我個人認爲台灣即使出現若干「後現代狀況」的徵兆，使得商業化、功利化和物化的力量左右了學術政策，也瓦解了如「五四傳統」對於科學的「合法化」敘事，然而就社會科學本身的發展

---

<sup>4</sup> 對於李歐塔與「後現代主義」之詮釋，並非本文重點，請另參閱 Benjamin (1992)、Lash (1989)。

脈絡來說，根本的問題還是知識在生產、傳播、應用、回饋的過程中，似乎忽略了「公共」的面向，也大大降低了社會科學與本土社會的相關性。

必須先澄清的是，所謂社會科學的「公共性」，絕非只注重知識的實用性，更拒絕陷入「本土化／國際化」的不當二元對立<sup>5</sup>，相反地，「公共性」在這裡的意義，既與我個人在研究非營利組織時，以組織的公開透明、非私人性、公益功能等特性所作的界定不盡相同，也不同於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所稱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sup>6</sup>，而較接近前美國社會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會長布洛威（Michael Burawoy）近來大力提倡的「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布洛威區分了四種不同的知識類型及受眾，並套用到社會學的專業範疇，參見下表。

	學術界受眾 (Academic Audience)	學術外受眾 (Extra-academic Audience)
工具性知識 (Instrumental Knowledge)	專業社會學 (Professional Sociology)	政策社會學 (Policy Sociology)
反身性知識 (Reflexive Knowledge)	批判社會學 (Critical Sociology)	公共社會學 (Public Sociology)

資料來源：Burawoy (2005a: 11-12)，作者整理後自繪。

<sup>5</sup> 「本土化」不應侷限於對台灣本土現象的研究，而是學術研究在這塊土地上的紮根；國際化也不應簡化成在英文期刊上發表著作（特別又加上只有收錄在SSCI資料庫中的才算數），而應該強調研究的「國際視野」，避免閉門造車。有關以SSCI之「數量」的統計來代表「品質」的謬誤，請參閱黃厚銘（2004）。

<sup>6</sup> 有關針對台灣非營利組織之自主性及公共性的研究，敬請參閱顧忠華（2000）；對於「公共領域」的討論，則請參考Habermas（1989）、李丁讚等（2004）。

在上面四種「理念型」(ideal type)中，布洛威特別賦予「公共社會學」以下幾種知識特質：溝通 (communicative)、共識 (consensus)、相關 (relevance)、指向公眾 (designated publics)、公共對話 (public dialogue)、和倡議流行 (faddishness)，這幾項特質自成一種「精神風格」(ethos)，而在布洛威歸納的十一個論題 (令人聯想到馬克思的「費爾巴哈題綱」)最後一項，他寫道：

假使經濟學的立場是市場及其擴張，政治學的立場是國家及政治穩定的保證，那麼社會學的立場是公民社會及對於社會的辯護。在市場專制及國家獨裁盛行的時代，社會學—尤其它的公共面向—是爲了維護人性之尊嚴而存在。(Burawoy 2005a: 24)

布洛威用心良苦，也確實針對社會學的不足之處提出了振興之道，不過，布洛威對於經濟學和政治學的評斷有欠公允，而且將社會學視作道德上高於其他社會科學的說法，不但無助於提升社會學地位，也與前面提到學科畛域愈益互相交錯，社會科學的「開放性」更鼓勵培養超出狹隘學科觀點的趨勢不甚協調。另外，布洛威對社會學的分類在歐美社會學界引起若干批評，不少學者認爲，「公共社會學」似乎不必單獨成爲一個類型，而可以與其他三類型的社會學充分整合。他在回應這些批評的意見時，仍然強調：即使存在著很多阻礙，但是公共社會學在社區、學校、工廠及公民社會的許多場所，都已經開始冒出來，因此需要特別去肯定這些努力，明確標示、稱呼其爲「公共社會學」，並與其他的社會學領域區別開來，否則它們就不會被注意到了 (Burawoy 2005b: 426)。

我們從前述有關知識演變的考察報告，以及社會科學界的幾次論戰，可以看到：學術工作者作為知識的生產及傳播者，殆無疑義，但是對於「知識為誰生產？」、「生產何種知識？」、乃至「如何生產知識？」等等基本問題，似乎還難以達成共識，三不五時便會重新辯論一番。這其實正反映了社會科學「反身性」的特徵，因為隨著社會的變遷，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就會產生不同的「敘事」，去因應不同的需求。站在本文的立場上，我們會主張這類問題不可能有標準答案，卻可以刺激社會科學更加「開放」，因為知識如果不經常進行內在的自我批判，說不定容易成為僵化的教條，中國文明在過去幾千年無法突破既定的知識框架，不正是缺乏這種「開放性」？而台灣的學術界，似乎從未建立「公開論戰」的文化，是不是代表學者們不願面對開放帶來的挑戰和衝突，形成潛意識裡「逃避開放」的心態？又譬如各項重大的學術政策，在決策過程充滿黑箱作業的不合理程序時，卻很少見到參與的學者透過公開辯論的方式來表達正反意見，這是否同時顯現台灣整體學術界在「公共性」方面的落後與保守，根本無法以成熟和理性的態度處理公共議題？

進一步引申本文所指的「公共性」意涵，可說包含了更為複雜的面向，也就是除了知識的「批判性」、「對話性」、「近用性」<sup>7</sup>、以及朝向「公共利益」之外，其實更重要的是，社會科學到底在哪些地方讓社會感受到這類知識的「不可或缺性」？換言之，社會科學有沒有讓自己在公共的想像中無所不在，並真實地感受到知識的價值？這種「價值感」不是用經濟利益、金錢物質衡量的「價格」，而是承認社會科學與公共

---

<sup>7</sup> 國內有關「公共性」的探討，經常涉及媒體的「公共化」問題，而在傳播學領域，公共化的主要指標即是公眾對於媒體的「近用權」，此處予以借用，亦請參閱方念萱（2001）。

生活有密切關連性的、帶有「無價」特性且須珍惜的一種對待方式。就像去問一般民眾：你在乎社會科學嗎？(Does social science matter?)，若與其他的知識領域相比，可能社會科學得到的肯定答案會少了很多？當然，民眾由於不屬於「學術界受眾」，或許有一定的刻板印象，但是不是也因為我們長期忽略與民眾的互動，或就算社會科學界本身的權益受到損害，社會科學家自己也很少挺身而出，將社會科學與公共利益加以連結，以致於民眾會認為：你們自己都不在乎，為什麼別人要在乎？

所以，談社會科學知識的「公共性」問題，可以轉換到「學術外受眾」或是「公民」的觀點，亦即將社會科學視作需要得到這些受眾或公民們「肯認」(recognized)，並以此取得一定程度「合法性」的知識。就此而言，「公共性」不一定侷限在哪一「類型」的研究領域，毋寧也如同「開放性」的意涵一般，強調這項條件的滿足，是為了讓知識更有推廣擴散和增進共善的「機會」。扼要說來，開放性是使「學術自由」成為可能的條件，如果沒有足夠的開放性，知識像是處於封閉空間之中，不能令想像力盡情飛翔；而「公共性」則是使「學術責任」能夠落實的助力，如果缺乏豐沛的公共性，知識像是鎖在私人倉庫之中，不能發揮造福人類的效益。

### 三、結論：社會科學的挑戰與回應

針對這兩項訴求，社會學作為社會科學裡，對於知識的「反身性」最為敏感、「自我反省」能力又最強旺的學科，可以有什麼具體的因應之道呢？從布洛威在美國及世界各地（包括台灣）四處「推銷」公共社會學的傳道精神來看，即使他的論述不盡周延，卻是重新建立社會學之「社會信任」的認真嘗試，十分值得敬佩。而他的行動力對於國際社會



學界的未來走向，是否會發生一定的影響，也有待繼續密切關注。回到台灣的脈絡，我們不妨思考，最近環繞學術評鑑制度以及資源重分配政策（如五年五百億）所引起的爭議，是否可以導向制度面與行為面的改進？制度上我們應該檢討：台灣社會科學的「學術社群」是否有足夠的機制，來保證不同的理論學派與研究觀點可以互相辯論，並且促進不同學科領域之間的開放交流；而現行的學術評鑑與審查制度，也應有合理的配套設計，避免各種「權力遊戲」或「黨同伐異」的歪風扭曲了學術的基本價值。在行為面上，也應該進一步問：社會科學「學術社群」中的成員，是否能有效連結學術與社會的介面，以生產出更多具有「公共性」的知識？這些知識不見得可以換算成某種經濟價值，但是對於台灣人或全世界人類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貢獻，成為記錄和詮釋我們努力心血的作品。<sup>8</sup>

全球化的腳步未嘗稍歇，原先社會科學被期待要以科學方法，揭露出社會發展的規律與法則，但如今面臨快速變動的時代，倒像是喪失了敏銳的洞察力與現實感，無法展現出知識應有的「魅力」。社會科學的反身性特質，不時促使我們必須清楚理解自己生產的知識來自於社會，也會回到社會之中，但在知識爆炸、資訊龐雜的環境下，社會科學卻似乎對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或是個別成員的所作所為愈來愈陌生。不過，許多學術界成員已如布洛威般，開始採取行動，正面迎接挑戰，我相信台灣的同行們，只要持續追求知識的「開放性」和「公共性」，在辛苦

---

<sup>8</sup> 鄭陸霖（2004：24）有一段話頗適合作為此處的註腳，茲摘錄如下：「誠懇面對我們自己的社會變遷，培養我們對於現實轉型變動的知識焦慮與敏感，大方地以西方理論材料為用，大膽提出回應這些變遷趨勢與轉型亂象的問題架構，以尋找社會出路的可能性為念，或許帶有這種實踐關懷的知識探究反而更容易累積逼近現實的紮實知識。」



耕耘後，必然會收穫更多豐碩的知識果實，在此期許大家共勉之！

## 後記

筆者在準備這篇卸任講稿的過程中，有不少學界同仁提供了及時的靈感，使筆者在口頭演說時，得以舉出更鮮明的實際範例，來充實本篇的論證，在此願意略作補充。譬如國科會人文處處長陳東升教授透露，原本國科會預算在立法院少有被杯葛的情況，但今年卻有立委揚言要大砍科學發展預算，理由是科學家做研究計畫，根本是「自家的事」，為什麼國家還要補助經費？這個例子在我看來，正驗證了有關科學「合法性」的「大敘述」，即在台灣也開始受到挑戰，學術界必須創造更多數據或新論述，來進行一場場「資源保衛戰」，否則可能面臨研究計畫「斷炊」的窘境。換言之，科學家過去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但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的「市場化」反而帶動了某種程度的「庸俗化」，科學必須卑躬屈膝來證明自己對社會是「有用」的，不是少數人的奢侈遊戲。

問題是，台灣的科學社群，尤其掌握權力的「科技人」階層，長久以來就有意無意地不斷加強「科學實用論」的價值觀，也狹隘地將有形的「產值」視作衡量科學成就的標準，以致於社會對於科學的期望，愈益被引導到功利的窄巷裡，完全忽視了「科學精神」的普及，可以促進社會成員的知識增長，從而對於社會整體福祉帶來無形的龐大效應。這樣的態度，其實發生「助紂為虐」的效果，也有點「自作自受」，因為整個社會就用功利的「對價關係」來斤斤計較科學的「價格」，而不會理解科學知識「無用之為大用」的本質。台灣的政治人物則更不用說，只會計算如何將排名視作「政績」，卻不顧及如何有效改善科學研究的

支持系統，減少官僚作風，以激勵更多創新實驗。這種趨勢，都使科學愈來愈淪為經濟力與政治力的附庸，而社會科學不僅未能超越泥淖，在一波波 SSCI、大學排名等爭議事件的衝擊下，成為受傷最重的當事人。

這一切，多少印證了社會科學界本身的不夠敏感，未能在社會科學「合法化」的問題日益嚴重前，便未雨綢繆，提出積極的對策，只有坐視制度環境快速地惡化，顯得束手無策。在這樣的情境中，本篇講稿想要提醒的是：歸根究底，社會科學必須勇於出面爭取肯認，並且扭轉不利的評鑑指標，而這方面的努力，包括如何加強學校教育及社會大眾對於社會科學的認識、如何深化社會科學對於社會議題的分析及回應、如何激發一般公民共同參與社會科學知識的生產、流通、應用與回饋等，皆指涉到社會科學知識的「開放性」與「公共性」。如果社會科學社群的成員們能夠建立共識，願意共同朝向開拓視野的「制高點」挺進，而不是在資源爭奪的混戰中消耗精力，那麼台灣的社會科學或許可以另行開啓活潑的生機，讓知識與社會產生更為緊密的有機關係。

最後，聽說近來在大學評鑑的報告中，有一所大學因為社會科學的特色是較批判取向，結果在評語中被寫成是有待改進的項目，而政治大學也因為校長遴選有教授投票的設計，被「五年五百億」的審查委員指為「民粹」。這些現象反映了台灣學術界的權力精英充滿「傲慢與偏見」，因為他們本身知識的「開放性」與「公共性」相當不足，與整個社會發展的脈絡也嚴重脫節，所以無法尊重與欣賞多元的、批判的、反省的價值。若說台灣的學術界想要「升級」，擺脫「知識代工」的宿命，可能還須從誠實的自我批判著手，一步步解構不合理的權威、不必要的管制、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如此才能撥雲見日、解放潛能，真正看到台灣學術發展的可能願景。是為後記。

## 作者簡介

顧忠華，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2004-2005）。主要研究興趣為社會學理論、經濟社會學、知識社會學、非營利組織社會學。

## 參考書目

- 方念萱，2001，〈與誰相共？台灣公共媒體公共性的紮根法研究—以公共電視公眾近用節目為主〉。論文發表於「台灣傳播社群與社會整合的關係」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民國90年1月13日。
- 李丁讚等，2004，《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台北：桂冠。
- 黃厚銘，2004，〈省思台灣社會科學學術評鑑制度〉。《當代》203: 38-45。
- 葉仁昌，1996，《儒家的階層秩序論》。台北：瑞興。
- 葉啓政，2003，〈台灣社會學的知識—權力遊戲〉。《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35: 1-34。
- 鄭陸霖，2004，〈擁抱後工業的實踐想像—《後工業機會》導讀〉。頁1-28，收錄於Fred Block著、鄭陸霖、吳泉源校譯，《後工業機會：一個批判性的經濟社會學論述》。台北：群學。
- 顧忠華，2000，〈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與自主性〉。《台灣社會學研究》4: 145-189。
- \_\_\_\_\_，2004，〈大學評鑑的顯性與隱性功能〉。《當代》203: 28-37。
- 顧忠華編，2001，《第二現代：風險社會的出路？》。台北：巨流。
- Adorno, Theodor et al., 1976,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 Beck, Ulrich, 1986,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 Suhrkamp.

- Beck, Ulrich,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1994,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 Benjamin, Andrew, ed., 1992, *Judging Lyotard*. London: Routledge.
- Burawoy, Michael, 2005a, "For Public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 4-28.
- \_\_\_\_\_, 2005b, "Response: Public Sociology: Populist Fad or Path to Renewal?"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6: 417-432.
- Burke, Peter 著、賈士蘅譯，2003，〈知識社會史〉。台北：麥田。
-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urgen,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Boston: MIT Press.
- Lash, Scott, 1989, *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 Lyotard, Jean-Francois 著、羅青譯，1989，〈什麼是後現代主義？〉。台北：五四書店。
- Wallerstein, Immanuel 著、劉鋒譯，1996，〈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